

## 田中慶太郎與文求堂書店

北京大學 劉玉才

二十世紀，在日本經營漢籍的書店中，自以文求堂名聲最著，且影響廣大。文求堂前身為皇宮御用書店“田中屋”，幕末文久元年（1861年）創業於京都，初代店主田中治兵衛，與品川彌二郎等勤王志士頗有交往，因此傳說在明治維新之後受到庇護。文求堂早期經營日文、漢文古書，還刊行過明治維新精神領袖吉田松陰的著作。明治三十年代初，文求堂後任店主田中慶太郎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漢語時，受到大阪青木嵩山堂自上海輸入漢籍銷售的啓發，還有就是同窗好友著名漢籍書志學者島田翰的影響，遂於1901年把店鋪移至東京，改變父祖經營方向，成為輸入販賣漢籍的專門店。明治三、四十年代，正是日本漢詩文流行與近代中國學勃興的交替時期，文求堂書店應運而起，漢籍業務順利發展壯大。而此時清王朝已趨向滅亡，伴隨皇室、貴族、官紳的沒落，珍貴典籍、金石字畫大量流向市場，價格暴跌。田中慶太郎藉此時機，頻繁往返中國，交結書肆、學人、藏家，掘得大量中國古籍販運回國，其中1908至1911年間還置業寓居北京，不惟蒐集珍籍善本，本人亦歷練成為鑒識文獻版本的行家。此後，文求堂與北京琉璃廠書肆建立起密切的業務往來，憑藉田中慶太郎廣泛的人脈和良好的信用，不斷輸入中國古籍，成為日本最負盛名的漢籍書店。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文求堂庫存古籍字畫焚燬殆盡，但田中慶太郎利用圖書館、學校教科書匱乏之機，改營新版漢籍、白話文教科書和學術著作，主要從上海輸入，取得可觀經濟效益。1930年前後，文求堂恢復古籍經營，並開展出版業務，主要刊行語言文字學方面書籍，流寓日本的羅振玉、郭沫若等人著作的出版，都得到文求堂的支持。1938至1941年，田中慶太郎派遣長子乾郎到北京學習，但因日本侵華戰爭影響，古籍販運幾近消歇。日本戰敗之後，文求堂事業陷於半停頓狀態，雖然嘗試開拓海外銷售，但仍難脫困境。1951年，田中慶太郎辭世，其子乾郎勉力維持兩年，又於1953年去世，文求堂因後繼無人，遂於1954年正式閉店。

文求堂最令人稱道的業績在於漢籍的販售，其五十年專營期間經銷的漢籍難以確切計數，但通過其陸續發行的《文求堂書目》，可以大致窺見規模。孫殿起《琉璃廠小誌》有專篇記載田中慶太郎在京蒐書情形：

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清光緒末葉，每年必至我國北京，蒐羅書畫法帖一次或兩次。與當代名流傅增湘等相友善，於宣統間，曾印《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是時我國學者，多喜讀集部書，故對於府州縣誌，無人過問，廠肆誌書，多被他人買去。普通本以羅計，每羅一文明杖高，僅售現銀一圓。其他善本稀見者，如三關四鎮誌，價亦相當低廉。其於書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廠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並經常托文友堂代搜《永樂大典》，每冊現銀壹佰圓，購去數十冊；並介貴陽陳崧山（田）度藏明板書數十箱，其中明人集類居多數，全部捆載而去。此外，舊本小說曲譜，亦多為他人購去。至我國商務印書館以及各圖書館，購買誌書、小說、曲譜者，皆在其後<sup>1)</sup>。

1) 孫殿起：《琉璃廠小誌》，第269-27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12月。

田中慶太郎本人接受訪談時，對於自己在中國蒐購古籍的經歷與旨趣亦多有敘述<sup>2)</sup>。如云1900年首次到中國，去過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因沒有什麼判斷能力，買了不少幼稚的書。次年，又前往北京，但不被一流書店當作顧客，只好到三、四流書店胡亂選了些雜書，幸運的是這些書帶回日本之後，竟然全部售出。當時日本正是漢詩人森槐南名聲顯赫時期，因此清人詩集，特別是日本流傳稀少的嘉慶、道光時代詩集，都有很好的銷路。此後，文求堂主要從上海購進石印本、局刻本，從北京購進古版本，內容方面則根據學術風尚選擇，但逐步擴展到經、史、子、集、叢五部漢籍。1908-1911年，田中慶太郎寓居北京期間，熱衷於宋元版、古寫本的鑒別，曾費盡心機買到邵懿辰《四庫簡明日錄標註》寫本，還印刷刊行莫友芝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以作為學習教材。其古籍版本鑒識能力由此大增，為文求堂購進不少善本珍籍。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交往，田中慶太郎還對書畫法帖產生興趣，購進數量亦相當可觀。

田中慶太郎對於政治鼎革、學術潮流與圖書市場的起伏，具有機敏的嗅覺，輔之以專業的眼光，故文求堂在不同時期似總能佔得先機。前引孫殿起文記述田中慶太郎人棄我取，率先購進方誌、小說、曲譜，即為例證。大量經營家譜、法律文書，也是文求堂開其先河。1909年，法國伯希和攜敦煌藏經洞掘出文獻途經北京，被中日學界視作敦煌學的肇始。同年寓居北京的田中慶太郎在第一時間造訪伯希和，并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詳盡記錄目睹敦煌文獻信息，首次向日本學界披露。此文與羅振玉的相關文字，成為記錄敦煌學發軔期的經典文獻，顯示出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清朝覆亡之後，內府精刊典制掌故類書籍，滿文、蒙文書籍，如《皇朝禮器圖式》、《皇清職貢圖》、《熱河志》之屬，價格暴跌，田中慶太郎趁機大量購進，再以數倍價錢賣出，甚至遠銷歐美。《永樂大典》散出之後，田中慶太郎經董康中介，從羅振玉處購得十冊，售與圖書館等單位作為範本，每冊僅150日元左右；此後又在北京陸續購得二十冊，其中五冊賣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十五冊賣給日本東洋文庫。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田中慶太郎並未只把眼光局限於發掘古籍善本、字畫法帖、珍稀文獻，而是敏銳地捕捉到日本近代學術興起對於基礎古籍、清儒校訂著作和中國新刊學術書籍的需求，并將其作為經營重點，因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群落，甚至深刻地影響到日本中國學研究的走向。

文求堂經銷漢籍難以計數，其中如北宋版《通典》、宋版《白氏六帖事類集》、唐摹本《聖教序》、宋拓《地黃湯帖》、《永樂大典》殘冊，最為人樂道，有些甚至列為日本國寶。實際文求堂對於構築日本公私收藏中國典籍基礎的貢獻，或許更值得大

2) 參見別冊《羽陵餘蟬》附錄之《漢籍書店的變遷》。

書特書。當然，這對於中國學者，無疑是心中的隱痛。文求堂作為一家書店，追逐商業利潤，本無可厚非，何況其顧客，亦不乏中國買家。民國時期，董康、傅增湘、張元濟、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人，均與田中慶太郎有密切的交往，其中不乏圖書的買賣鈔借事例。傅增湘雙鑒樓舊藏的部份珍本，就是售與文求堂，日本著名東洋法制史學者仁井田升在回憶文章里，即感謝田中慶太郎允其利用傅氏舊藏<sup>3)</sup>。晚清貴陽學者陳田（字松山），編有《明詩紀事》，平生嗜藏明人著述，頗多珍罕版本。民國之後，因生活困頓，被迫鬻賣藏書。傅增湘、張元濟聞訊未及籌資，遂為田中慶太郎先行購去。《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二年（1913）四月號附錄《陳松山舊藏明朝人詩文集》587部，4087冊，包括明刊357部，寫本34部，清順康以下刊本196部，售價8500日圓。當時羅振玉正寓居日本，又斥資購返，歸於烏程蔣氏密韻樓度藏<sup>4)</sup>。蔣氏書散出後，為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藏，1932年“一二八事變”與涵芬樓化為灰燼。

田中慶太郎雖以販售圖書為主業，但交遊極廣，同行業者之外，與學人藏家關係密切，這也是其經營成功的重要法寶。文求堂在中國書業的信用“大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東京琳琅閣書店主齋藤兼藏語），書肆競相供書；而北京、上海的書肆到東京展售圖書，也都得到田中慶太郎的全力支持。日本侵華期間，雖然資金往來不便，但仍有北京書肆主動向文求堂賒售圖書。田中慶太郎與中國學者藏家，除去前記買賣關係之外，還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友誼。根據董康的日記，其每次到訪日本，都以文求堂為據點，接受田中慶太郎的周到照應。傅增湘、張元濟等人的日本訪書活動，也都得到過田中慶太郎的大力協助。東京文求堂入口處的匾額，就是傅增湘所題。若以在中國學界的人脈而論，恐只有上海內山書店可以比肩，但內山書店主要經營日文圖書。與內山書店交往甚密的魯迅，也得到過文求堂的關照。1935年，田中慶太郎派女婿增井經夫專程前往上海，邀請魯迅到日本自己的別墅療養。在田中慶太郎交往的中國學者文人之中，又以郭沫若相交最密。1928年至1937年，郭氏流亡日本，無論學術工作還是日常生活，都得到田中慶太郎及其家人的盡心幫助。其間，文求堂出版發行了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九部古文字著作。根據增井經夫保存的二百餘通郭沫若致文求堂信札<sup>5)</sup>，在在可見文求堂為郭氏研究提供參考圖書，查閱文獻，編輯校訂文字，以及接濟生活的事例。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等人的回憶文章也記載郭沫若因無力購買，而向文求堂借書，以至成為文求堂座上賓的經歷。1955年，郭沫若率團訪日，曾特意到田中慶太郎的墓地致敬。田中慶太郎的家人也始終保持與中國

3) 仁井田升，《文求堂和我》，見載田中壯吉編《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第26頁，1987年版。

4) 羅繼祖，《楓窗三錄》卷四《肆雅集》條，第416-417頁，大連出版社，2000年版

5) 馬良春、伊藤虎丸主編，《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的友好關係，其三子田中壯吉編有《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一書，收錄各方回憶文章和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人致田中慶太郎的信札，以中文刊佈。

文求堂在日本則有“東洋學界的岩波書店”之稱，不惟經營漢籍品種豐富，兼營學術、語言出版業務，而且成為相關文獻信息的集散地，學術討論的沙龍。田中慶太郎以其傑出的語言天賦，豐富的學術人脈，獨到的學術見地，折服了眾多學界中人，外號“本鄉的鬼谷子”。內藤湖南、石田干之助、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古城貞吉、長澤規矩也等中國學問大家，都是文求堂的常客，並帶動了相關專業年輕人到文求堂訪書聽講的風氣。有關西學者甚至戲言，到東京去，東洋文庫看書，文求堂聽講，是必不可少的兩件事情。田中慶太郎品評學界，臧否人物，往往不假辭色，但對學術研究的支持，年輕才俊的提攜，亦是不遺餘力。荷蘭高羅佩讚譽其為兼有“愛書”、“清談”兩種傳統品質的少數漢學家之一，是一位可以被當作學者而從心底裏油然而產生敬佩的人，並在駐日大使任內發起編輯追憶文集，以誌紀念<sup>6)</sup>。相關專業的學術權威共同撰文紀念一位書店店主，可謂史無前例。

田中慶太郎的專業造詣主要體現於漢籍版本的鑒識，其同窗好友島田翰以漢籍書誌學、校勘學名家，甚為自負，不輕易許人，但對田中慶太郎的學識讚譽有加，二人可謂惺惺相惜。島田翰自縊身亡後，田中慶太郎將其遺稿結集為《訪餘錄》刊行，分贈同好，以誌紀念。日本京都學派的領袖學者內藤湖南，在《目睹書譚》書內，直言當時東京學者中，以古書鑒賞能力而論，無一人可及文求堂主人。在東京的書業同行之中，更是將田中慶太郎視作一言九鼎式的人物。弘文莊店主反町茂雄在回憶文章裏把田中慶太郎的逝世，比作日本業界在關鍵地方損失的大洞，今後五年、十年也難以彌補<sup>7)</sup>。

田中慶太郎撰寫的專業文字並不多，主要是原在《日本古書通訊》連載的瑣記文字，後結集為《羽陵餘蟬》，且僅涉及甲乙二部。該書以書目為綱，細述版本傳佈、典藏流通以及相關掌故，內容豐富，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書中隨處可見作者的版本識見、經驗積累和學術見地。如指出相臺岳氏刊本《禮記鄭注》卷十九《大學》注，採入朱子《大學章句》內容，以“程氏曰”、“文公曰”形式加在鄭注、釋音之後問題。清官刊本《皇朝禮器圖式》，圖樣備極精巧，作者根據輪廓與圖磨損程度的差異，斷定二者分別印刷，圖是用銅版刊刻，輪廓則為其後所印，頗具識見。在《春秋公羊傳解詁》、《說文解字》、《史記》、《直齋書錄解題》等書目之下，作者不惟細述版本源流，還施以學術史分析，亦堪稱有見地的研究文字。作者還顯示出通

6) 參見日本《朝日新聞》1966年5月22日第12版的報導。

7) 反町茂雄，《文求堂和他的主人》，見載田中壯吉編《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後19頁，1987年版。

達的學術理念，如既服膺清儒校訂古典的成就，又對他們止步於古典與古典之間的往復，缺乏更高的學術追求，予以批評。書中對《四庫全書總目》、《經籍訪古誌》的學術取向、著錄訛誤，也多有糾正。可見，田中慶太郎兼有書商和學者的面貌，故其在文求堂發表的臧否言論，學人中間亦不乏擁護。

田中慶太郎的版本鑒識水平，其實還可通過《文求堂書目》予以揭示。日本書業相沿有發行目錄的傳統，文求堂具體何時開始發行書目，不可確知，依據現存書目記載，應不晚於明治31年（1898），但較大規模編輯漢籍目錄，當是從明治三十四年（1901）開始。據田中慶太郎自言，他把在中國採購的圖書通過小郵包寄回日本，隨到隨賣，賣不掉的書，則待其回到日本，編製目錄發售。《文求堂書目》還包括《文求堂發兌唐刻書目》、《文求堂輸入唐本書目》、《文求堂發賣書目》、《文求堂新古唐本書目》、《文求堂唐本書目》、《文求堂碑帖目錄》、《文求堂新收書目》等名稱，其顯著特點有四：一是專門收入漢文典籍；二是著錄版本、紙張、墨色、行款、藏家等項信息；三是附錄資料豐富；四是連續時間長達五十餘年，直至閉店。書目多以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有時附列碑帖（或單列目錄）、朝鮮本；經營新版書籍之後，又分作古書、新書兩部份，各自分類。著錄用語方面，寫本、刊本、抄本、活字本、石印本，宋槧、元槧、明刻、殿版、叢書本、朝鮮本，原刻、初印、覆刻，開花紙、白紙、巾箱本、小字本，等等，在在可見作者鑒識版本的深厚功力。如“舊鈔本《函山集》十卷，明劉天民撰，山東巡撫徐績採進原本”，“宋槧小字《妙法蓮華經》七卷，臨安王八郎家經籍鋪刊單行本，印板精絕，狩谷掖齋舊藏，自筆題簽”，“明初覆元本《文章規範》七卷，宋謝枋得編，丁氏八千卷樓舊藏本。〈讀李翱文〉、〈岳陽樓記〉、〈歸去來辭〉目錄後均有門人王淵識語，實存原本面目，與通行本不同”。昭和初年刊行的《文求堂善本書目》，收入120餘種中國珍稀古籍，附有48幀圖版和簡要的著錄文字，製作精美，被譽為從內容到外觀都是空前之作，並成為業內鑒定古籍的標準。《文求堂書目》附錄的資料有田中慶太郎選擇的稀見文獻，如《南學製墨劄記》、《銅僊傳》、《海王村遊記》、《七頌堂識小錄》、《臨池心解》、《攀古小廬文》、《白嶽凝煙》等，此外還有羅振玉寄售東山學舍影印書目、文求堂出版支那語學書目、文求堂發行書籍簡明目錄等，亦頗具文獻價值。二戰之後，文求堂又編輯新收書目，向國外推銷，直至1954年閉店，最後發行《文求堂展觀書目》。

《文求堂書目》記錄了許多中國珍貴古籍流散的蹤跡，也見證了日本漢籍書業的興衰起伏，同時還凝聚著田中慶太郎以及日本書誌學者的版本識見，無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但是因為銷售目錄的性質，很少有人刻意收藏，以致到神田喜一郎的時候，已經鮮有留存。文求堂自身經過東京地震焚毀之後，此前目錄也是一冊無存，故神田喜一郎特意將自己保存的部份明治時代目錄交給田中乾郎作為紀念

8)。筆者在高橋智、陳捷教授的提示下，起意彙編《文求堂書目》，以饗學界，但是遍檢海內外各圖書館目錄，僅有零散收穫。幸賴高田時雄教授慷慨支持，提供積聚多年的私人收藏，以及日本國會圖書館等處的收藏信息，方能湊得大部份期號。美國艾思仁先生，又友情提供私人收藏的《文求堂新收書目》1949年至1953年間部份期號，補充了文求堂閉店前幾年經售圖書狀況。根據調查，公藏方面尚有日本東京千代田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鶴見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處存有零冊，但因手續原因，一時無緣複製，擬留作補遺。

彙編影刊《文求堂書目》是筆者所在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統籌的課題之一，承蒙中國國家圖書館張志清副館長美意，納入《海外藏中文古籍目錄叢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

8)神田喜一郎，《啊，文求堂》，見載田中壯吉編《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第32頁，1987年版。